欣然于无名劳动

——钱锺书与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

■刘叔明

正如他那举世皆知的名字一样,钱锺书先生一生钟爱书,而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的不解之缘,更是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段佳话。

文学所于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当时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并附设在北京大学。1956年划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5月7日经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正式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成立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2008年3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当时社会科学院有10余个重点所级图书馆,如历史所图书馆、哲学所图书馆、近代史所图书馆、考古所图书馆和文学所图书馆等一些比较老的图书馆,但文学所图书馆在藏书总量、古籍藏书量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文学所图书馆现有各类图书共计40万册,其中普通古籍2万种、善本古籍4千种,古籍书共16万册,平装书20万册,港、台书1万册,期刊2万册,各类画册、报纸合订本近1万册。

钱锺书1953年2月22日随文学所成立之日起即到文学所,从事西方古典文学研究。他当时已是著名学者,却非常关心和支持图书馆工作,为文学所图书馆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文学所图书馆藏书不多,主要是从北大带来少量图书,以现代作家作品以及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类为主,比如鲁迅、巴金、老舍、郭沫若等一批现代作家创作作品和研究集,还有一批现代文学期刊,这批书籍有近10万册,几乎构成图书馆藏书的主干。藏书单调,所以远不能满足科研需要。当时文学所领导认识到,图书馆建设直接关系到文学所科研的持续性发展,是所内工作的重中之重。1957年时任文学所所长的郑振铎,建议成立"文学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为加强图书资料建设,同年还专门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钱锺书任主任。

所领导让钱锺书分管文学所图书馆不是偶然的,与其之前的经历不无关系。钱锺书早期在清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昆明西南联大、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无论是求学还是任教始终是图书馆的常客,"他博及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怀"(柯灵《促膝闲话锺书君》,《钱锺书研究》,第一辑)后受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邀请,担任英文馆刊《书林季刊》总纂,在图书馆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文学所图书馆委员会主任一职非他莫属。钱锺书上任后,认认真真地办实事,为文学所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献计献策。

他制定了"为科研服务"的办馆方针,和"以专为主,精中求全"的发展方向。

当时钱先生认识到,图书馆建设要做到为科研服务,图书采购要有的放矢,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为此,他广泛听取各学科专家意见。当时文学研究所共设九个研究组:文学理论组(组长蔡仪)、古代文学组最初分为两个组,即中国文学组(组长余冠英)和文学史组(组长何其芳兼)、现代文学组(组长杨思仲,后由唐弢继任)、民间文学组(组长贾芝)、西方文学组(组长卞之琳)。后来,又陆续成立了苏联东欧文学组(组长戈宝权、叶水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组长何家槐)、东方文学组(组长季羡林兼)。各组负责人都是知名专家,钱锺书让他们根据各自研究需要,列出购书单,交所图书馆统一购买,既保证图书质量,又避免重复,节约了经费。至于采购普通参考书,则由图书馆主任斟酌考量后,上报图书管理委员会再行购买。实现了"为科研服务"的办馆方针。

文学所图书馆当初藏书不足10万册,钱锺书上任后经过多年发展,到了文革前,文学所图书馆具备相当规模,形成了三大支柱——诗文集、戏曲、小说。诗文集方面:如陶渊明诗文80多种,其中善本40余种;明代诗文集1000多种,其中善本600多种;清人诗文集3000种,其中善本500多种;晚清及民国初年诗文集1000种;"五四"运动前后及左联、抗战时期至建国前诗文集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郭沫若等著名作家原著400多种,其中善本书100多种。本馆还收藏弹词400多种,宝卷300多种;其中海内孤本30种以上。除此之外,还包括省、府、厅、州、县、山、水等各级志史料,除文学类外,有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各类,一应俱全,形成了具有专业特色的图书馆。

在文学所,像钱锺书那样懂书、爱书的行家还有王伯祥、孙楷第、李健吾等。他们慧眼识书,具有不凡的鉴别能力,能识别伪作真品,遴选最优版本,真正实现了"以专为主,精中求全"的发展方向,为文学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古籍书采购,是当时图书采购的重点,购这类书钱锺书强调不仅要做到全,而且要尽量采购原书,因为重印本难免会有疏漏,不利于科研。所以,文学所图书馆的古旧书籍,一般是到北京旧书肆购买。方式或为书肆人员送书上门,或为馆里派人去购。北京旧书肆多指琉璃厂、东四等古旧书市。琉璃厂则是古旧图书和珍贵文物资料荟萃之地,如三友堂、效贤阁、通学斋、莱薰阁、知文书店、大雅堂等处。如今翻阅馆藏一些旧书籍,犹见这些店铺的名签夹杂在其中,所购书价、函册、页数、购书年月等都有记载。

图书管理委员会委员汪蔚林、范宁、吴晓铃等人还亲自参与外出购书,上世纪末,北京和平门琉璃厂旧书店老人,不仅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能忆起他们的一些购书轶事,在文学研究所被传为佳话。当时吴晓铃家住校场口,距琉璃厂很近,他本人酷爱藏书,经常光顾琉璃厂各家书店,为自己同时也为所里选书,众所周知,作为著名学者的他与侯宝林过从甚密,更被各家书店视为上宾。其次是到外地购书,当时文学所图书馆长汪蔚林几乎跑遍全国各地图书市场。简略举要如下:1957年在南京古旧书店购《焦山书藏书目录》四卷;1957年在上海温智书店购《荷花宝卷》光绪岁次;1958年温州古旧书店购"温州府前街墨香簃发行"《昇仙宝卷》光绪三十年;1957年哈尔滨万有书店购《嘉兴董氏保泽斋》;1957年天津古旧书店购《天一阁书目》(明)范钦藏;1958年广州古旧书店购《西吴里语》;1958年河北省立验城市民众教育馆购《八千卷楼书目》;1957年杭州和合桥东首文艺斋购《繡像韩湘宝卷》光绪甲午。

另外,为加快文学所图书馆建设,1957年年末文学所还有一项补充规定,凡外出开会学者同样肩负为图书馆购书任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弥补古籍图书的不足,钱锺书向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情况,建议划拨图书,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文学所建所伊始,承担了国家赋予的中外文学史编写任务,但文学所图书馆藏书远不能满足科研的需求,文学所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情况未果。1957年初,受文学所委托,钱锺书代所拟函送周总理,信如是写道:"国家交给文学所编写各国文学史和编选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繁重任务,原书尚且缺少,更何从编选?所内工作需用的书籍极为短缺。"信中还提到:"文学所渴望已久的书籍,在现存单位却束之高阁,并没有在学术研究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积压着大量的珍贵财产,一方面作为国家惟一的研究机构,我所却得不到应用的书籍,不能很好地进行研究,这是很可惜也是极不合理的现象。如果将这批书刊拨给其他藏书丰富的单位,则是'锦上添花'的重复存储,不如'雪中送炭'拨给我所以应急需。"(马靖云《欣然于无名劳动》,见《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促使一批科研急需的图书顺利地拨给了文学所,如稀见明版家谱数种、《石林奏议》《庄子内篇》《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又如陶渊明诗文集善本图书不同版本四十多种,其中不乏名家稿钞本,品质亦高,在国内是不多见的,为研究陶渊明诗文,提供丰富研究资料。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各类书籍,为本馆添置中文书籍之最大宗,并成为当时文学所图书馆藏书的主干,使文学所藏书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这批图书不仅解决了当时文学所撰写文学史用书不足问题,而且为日后学者研究提供了便利。这次书籍划拨,当时得到所内研究人员的一致好评,在整个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不少学界名人慕名来文学所图书馆借书。

钱锺书在学术大家中藏书较少,他主要是借书看,书在钱家经常是进进出出的。钱锺书是海内外著名学者,所以,每年接受的海内外赠书很多,看过之后,他认为有价值的书,会经常送给文学所图书馆,其中不仅有中文书,还不乏大量外文书刊,既丰富了文学所的藏书,又节约了购书经费。

随着文学所古籍藏书日渐丰富,借阅古籍者明显增多,为更好保护古籍,在钱锺书倡议下文学所图书馆于1960年成立了古籍修复部门,对大批古籍进行修复和加装函套,对古籍图书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钱锺书很爱惜图书馆藏书。钱锺书借书量大在文学所是有目共睹的,他几乎每周都到图书馆借阅图书,他借书遇有图书损坏,常作必要的修补,自己不能解决,便会告诉工作人员,请专业人员解决。钱先生做事认真是出了名的,在河南干校,钱锺书负责报刊和信件收发,由于他责任心强,对工作十分认真细致,所以在他手里从未丢失过报纸和信件。

钱锺书给图书管理人员讲解古籍图书。他说藏书题跋是相当自由的文体,凡有关书籍的源流、内容、递藏、逸闻均可谈及,还谈到古籍书中半页版以及版筐和书中眉批,尤其强调了眉批在书中的重要性,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前人研究一部书的结晶,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为了不使该批语丢失,经常嘱咐管理员登记,另外,对于古籍书中版筐页有磨损的,让修复部门加装内页纸,保护书的完整性,这些对于图书工作人员如何保护古籍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钱锺书为人直爽,有什么说什么,很纯真,绝无装腔作势、摆架子。钱锺书是图书馆的常客,每周到图书馆借书,他常与工作人员交流,在肯定他们工作的同时,还向他们讲解各类图书,既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他们的业务能力,有些人在钱锺书的鼓励和支持下,培养了读书兴趣,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勤奋好学,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学有所成,甚至有人从图书管理员提升到科研人员。

文学所图书馆经过长足的发展,成为国内颇具特色的专业性图书馆,不仅如此,馆藏事业的发展也为文学所图书馆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图书管理人员。钱锺书不仅十分重视图书馆工作,而且以图书馆培养科研人才。当时文学研究所每年都有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钱锺书建议让他们到图书馆抄写卡片锻炼一年。此举并不是图书馆人手少临时抓差,而是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步,通过抄写卡片,让他们熟悉图书馆藏书,哪些领域有哪些书,为今后搞研究查找资料打下坚实的基础,把图书文献工作与科研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文学所的特色和传统保存至今。

文学所图书馆还是学术探讨的场所,钱锺书经常参与。每周二是文学所返所日,也是研究人员借书日,图书馆便成为学者聚会探讨学术之地:同样是学术大家的吴世昌与钱锺书在学术探讨上争论的最为激烈,而俞平伯与钱锺书则有更多的学术认同。钱锺书不仅与人讨论学术问题,还帮助年轻学者找图书,并为他们提供相关研究书目,著名学者邓绍基先生就曾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初到文学所,邓绍基有一次在书库找书,徘徊之际遇到钱先生,问他找什么书,他说完,钱先生让他到第几排第几层去找,按其所示,果然找到,而且还给他提供相关研究书目。

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能有如此丰富、价值堪称一流的藏书,固然应归功于几代图书馆人的辛勤工作,但也与当时诸多老专家和学者的支持分不开,其中钱锺书先生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杨绛先生在回忆钱锺书与图书馆的关系时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钱锺书先生还曾担任过文学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作为世界上享有赫赫声名的一流学者,钱先生读书、爱书、知书,而选书和买书更是他的特长。举凡中文善本、孤本能买到的他都买:英、法、德、意等外文经典著作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文学所图书馆应有尽有,以至于外宾参观时都惊诧于文学所图书馆的精当与完美。"(杨绛《我们仨》)

钱锺书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他为图书馆做出的贡献,为几代图书馆人所传诵,成为图书馆敬岗爱业的学习楷模。何其芳先生曾说过"名人的成就中包含了大量无名的劳动。"(《何其芳文集》)钱锺书先生的确是这样一位甘愿付出"无名的劳动"的学术名人。

清代安徽建省后两位倪姓藏书家

■李传玺

历史就是如此奇妙,长江两岸相距不到百公里的两大倪姓家族,其代表人物先后都成了清代安徽建省(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后最大的藏书家,且以此对传统文化建设都作出了独特贡献。

前两年,应约编写《徽州古村落》,在祁门渚口,自然会去看至今仍算是徽州古建筑的杰构、也是安徽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一府六县"。当年徽州府辖六个县(歙县、绩溪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和婺源县),渚口的这幢老宅一个大厅带六个小厅,后来人们以徽州府的行政架构作比送给它这么一个豪迈的称号。大厅名叫"慎余堂",是宅主倪望重居所。东边紧挨着它的是一座二层小楼,人们称它为"万卷楼"。这是倪望重的读书楼也是他的藏书楼。倪望重一生酷爱藏书,到处搜罗,并且收藏到许多宋元古本珍本,每有收获,即用特制的樟木箱加以盛装。当他和兄弟开始修筑自己家族这个大宅时,又特意在自己的居所旁设计了这样一个藏书楼。

倪望重为什么酷爱藏书,一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虽然终生只是个禀生,但读书广泛,并且著有《诗经草木鸟兽虫鱼参义》四卷、《四书疑句辑解》两卷、《乐府古题要解集》《辍耕吟稿》《课徒时文》《辍耕笔记》等。二是受早年自己读书艰难经历的影响。在他还很小时,父亲突然去世了。那个时候,家里如果有个长期困于科考的读书人,日子是不会富裕的。现在父亲又走了,生活自然更加窘迫。他已经读不起书。怎么办?是走"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一般人家后生出外学做生意的路,还是把父亲的路继续走下去。母亲毅然抛开脸面,出外乞讨,用每天遭人白眼要来的钱,开始供养并激励儿子把书读下去。他曾把自己读书的艰辛撰成一联:"通盘打算,毫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还有一条活路,文通即是运通。"他终于读通了。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状元陆润庠),倪望重考中了进士(三甲第146名,共202名),之后,六任县令,还曾担任浙江乡试同考官,最后做到资政大夫。

倪望重著有《慎余斋全集》,内收文集、诗集、笔记、祁门县志补、祁谚考、谕民纪要、图书目录等,校刻了《戊笈谈兵》十卷、《读读书录》两卷、《读困知录》三卷。丰富的藏书应该说为这些著述与校刻打下雄厚的文献基础。他的藏书嗜好熏陶了家族其他人,弟弟和儿子也都喜好藏书。于是他的藏书不仅没有散失,反而得到了充实与扩大。新中国成立后,当国家文物部门得知小小的古村落有个藏书楼时,立即派出著名版本鉴定学家赵万里亲临渚口查验,并动员倪氏后人将它们全数上缴给了国家图书馆。倪望重的藏书终于有了好的归宿,也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以及传统文化研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去年五月,我来到望江华阳扶贫。从华阳东行四五公里即"不越雷池半步"的诞生地雷池乡,那里的倪姓家族竟然同样出了位大藏书家——倪模。据元明清三代进士辞典介绍,他是安徽建省以后首位大藏书家,并且还是清代著名的古钱币收藏家与研究家。在雷池乡简陋的云林(此地倪姓以元代著名画家倪瓒为始祖)纪念馆,我读到了倪模的简介。倪模(1750-1825)字迂存,号预抡,又字遇林,号韭瓶,世居大雷岸,以耕读为业。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举。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考中进士(三甲第120名、共143名)。自作座右铭:交耐久朋,无欺心语,作有益事,读未见书。受这个志向的影响,他一直对考中后为官不感兴趣。乾隆五十二年(1787)考充景山官学教习,期满后,朝廷拟擢任他为知县,他却说:"知县为亲民之官,判断轻重稍失宜,恐不能为民造福,且余性戇直,与其俯仰桔槔,孰若归田著书之为乐乎?"考中进士后,仍不愿为官,他对人说:"五半米折腰吾能为之乎?吾家尚有薄田可耕,江干老屋数楹,藏书充盈其间,吾以终身可矣。"后在老师的劝说下,才就任安徽凤阳府教授。可一任满,即回到雷港老家,筑室二水山房,继续从事他的收藏、研究和著述事业。据说他的学生赵文楷(嘉庆元年恩科状元,赵朴初先生六世祖)从长江雷港上岸后,听说他在家,想拜见他,他害怕赵又来劝说他出去为官,竟拒而不见。道光五年(1825)去世。

从他中进士后辞官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他藏书时间很早,可能在年轻时就开始了。有资料说他在京师时"每见异书,必倾赀购之,以至质衣以偿"。又到琉璃厂书肆,与诸藏书家互换秘本雠校,所积书先后至10余万卷,成为安徽当时藏书之首。家有书楼"经锄堂",作有《经锄堂各架藏书序》。嘉庆五年(1800年)于读书草堂后,再起小阁七间,名"江上云林阁"。编有《江上云林阁书目》,自称藏书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十得七八,在存目者亦得其半。

藏书是因为喜爱书,可藏书的目的却因人而异,大部分是为藏而藏,或者是为别人读而藏,以至有"书非借不能读也"的感慨。倪望重不仅仅是这样,他自己还要读,他还要以此进行研究著述,还要为家族保留读书的种子。这里的倪模时间比他早,但同样是自己还要读,自己还要进行研究著述。史料说,他每得秘本,常夜以继日,手抄口诵,自少至老无倦时。由此先后校勘经史诸书数十种,著述数十卷。《安徽通志列传》中评价说:"综其所撰,有裨教化者则《倪氏族约》、有裨经世者则《导淮由天长合肥注江辨》、有裨著录者《经锄堂书目》七十二卷、有裨经传者《双声古训》十卷……"另外还有他的综合性文集《迂存遗文》,研究望江雷池文化的《雷港源流考》《雷港琐记》等。

他的藏书更是助他在古钱币收藏特别是钱币研究乃至中国古代金融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年后,通过与当时名泉家江秋史、宋芝山、翁宜泉等人的交往和多方请教,他开始锐意蓄钱,且利用自己丰赡的藏书详征博考,几十年如一日,不仅成为清代名泉家之一,而且写出了至今仍在学术上产生相当大影响的皇皇巨著《古今泉略》《泉谱》。王贵忱先生在《古今泉略》题记中称之为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之巨作","清季所刊钱谱无出其右者"。热爱上收藏古钱币、研究古钱币的鲁迅对此书也十分喜爱,并花大价钱购买,据此进行古钱币研究。

倪模去世后,同科状元、有清一代蜚声朝野的著名学士姚文田给他写了墓志铭,"钱之癖,非和峤(?-292,西晋汝南西平人,字长舆。少慕其舅夏侯玄,有盛名,为颍川太守,迁中书令。曾参预灭吴谋议。惠帝时,官太子少傅。家富性吝,杜预称其有"钱癖")俦;书之淫,与皇甫(皇甫谧,魏晋间作家、医学家)侔。贯穿古今穷源流,山经地志皆研搜。学海博涉内行修,一时贤士从之游。力敦任恤戒薄偷,涵育后起储薪槱。斯人一逝归山丘,典型衰谢谁复留!我为铭之藏墓幽,令名奕奕垂千秋。"足见对倪模评价之高。

有记载说:"教授美髯须,长尺许,道貌充腴,巍然山斗";又有记载说,为了搜集古钱币,他常年携一囊,行于街市、乡野,四处求购,虽隆冬盛暑长年不辍。把这两种形象拼接到一起,加以对比,加以想像,一个在当时颇受尊崇的进士,一个有着如此魁伟身躯的教授,竟然常年仆仆于乡野,形同贩夫走卒,如果没有一种执著与痴迷,无论如何,他不会做,也做不出。世间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就主体来说,没有精神上的痴迷与执著作根基呢?

遗憾的是,他去世后,他的巨大收藏散失了。

欣慰的是,他去世后,他的后代们把他的著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把古钱币研究巨著给印行于世,从而使他的执著与痴迷至今仍能滋养着我们。

致歉声明

本报2018年1月24日五、八版刊出王祖远撰《鸿雁叼来的文学史——钱锺书致夏志清书信解读》一文。文中所引钱锺书先生于1979年至1994年间写给夏志清先生的多封信件内容,未获授权,侵犯了钱先生的著作权。特此向钱先生著作权继承人及广大读者致歉。我们将以此为戒,避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

王祖远

中华读书报

2018年1月31日